

晚 清 民 国 学 术 书 系

汪康年：从民权论 到文化保守主义

廖 梅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晚 清 民 国 学 术 书 系

汪康年：从民权论 到文化保守主义

廖 梅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廖梅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12
(晚清民国学术书系)
ISBN 7-5325-3028-0

I. 汪… II. 廖… III. 汪康年(1860~1911)—
研究 IV. D09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386 号

晚清民国学术书系

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

廖梅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25 插页 5 字数 412,000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5325-3028-0

K·341 定价: 24.00 元

序

朱维铮

汪康年属于思想史上常见的这样一类人物：他本人并非思想家，却在同时代的思想界起过重要作用，以至谁想研究这个时代的思想史，谁就不能无视他的存在。

1980年代上海图书馆刊布的《汪康年师友书札》，那四巨册所录的三千余通书信，作者既有清末的维新名士、新学大家乃至革命先进，也有政坛名流、地方官绅以及中枢大臣，从中已可见由戊戌到辛亥的十多年间，汪康年在学界政界的活跃程度。

不过，作为真正由第一手的史料汇集而成的《汪康年师友书札》，固然极其珍贵，却有着书信体史料的天然不足。那就是它们都属于私人通信，一般用来交换收发双方个人或很小群体之间互相感兴趣的信息，就是说写作目的通常不是为了发表，因此涉及历史研究由以确定基本史实的史料诸要素，所谓时地人事，往往语焉不详，并且为安全计，还故意不署时间地点及双方名衔，更常用隐语代称以表示指涉的人或事。不仅如此，由汪康年、汪诒年兄弟细心保存的那大批书信，都属于“来函”，除少量有汪康年等人的片言批注以外，都没有汪康年的原函或复函可资比照。因而作为历史资料，它们都是单方面的，即使指涉的时地人事都较清楚，依然会给研究者带来困惑，难以从中认知汪康年或相关事主的见解、回应与活动实相。另外，手稿的漫漶和笔迹不一，以及众手编校必有的水准参差，也使书札的整理出现若干失误。

正因如此，《汪康年师友书札》向我们展示了晚清研究资源的

一个“富矿”，然而这个矿藏的丰富，恰好映现理应与它共生的那种资源的贫瘠，即越发突显汪康年本人留下的文献材料是多么匮乏。按照有来有往的通信惯例，汪康年手书的函札，至少也应有上千通，如今可见的却寥若晨星。同样，从参与创办《时务报》，到闻知武昌新军起义而仓促出京并随即暴卒，在他五十一年的一生涯里的最后十五年，都以民间报人的形象出现。他相继主持过六家报刊，还曾策划创建民营的国际通讯社。他与后来那班报业老板或传媒官僚的一大区别，就在于他有个人理想，有相当学识，又有近似愚拙的务实风格。无论在维新运动中替帝国的“自改革”吁求呐喊，在立宪运动中为民间监督权力运作的舆论助威，他都曾自行操笔作文，大至发政论，小至做补白，累计篇数颇为可观，但死后辑集成书的，只有汪诒年所编的薄薄三种。至于他生前的嘉言懿行或庸言拙行，散见于清末民初种种出版物，自然更不见搜罗清理。

上个世纪开头那年，汪康年的一群朋友纵酒品评当世名人，章太炎借大观园人物图来刻划诸人形象，戏拟慈禧为贾母，光绪为宝玉，康有为如林黛玉，张之洞如王凤姐之类，而派给汪康年的角色，便是刘老老。那位乡村老妇，照《红楼梦》的描写，外貌憨厚而内明世故，举止笨拙而不失礼数，见侮不辱而仗义扶危，的确与汪康年为人处世的作风有点相似。但正如刘老老在某些红学家笔下变成了唯知势利的小丑那样，汪康年偶尔被戊戌维新史的论著提起，也完全成了反面人物。例如说及《时务报》的汪梁之争，说及《时务报》改官报事件的汪康矛盾，错的必是汪康年。理由呢？据说当时的康有为、梁启超都力倡变法维新，代表进步，因而与康梁不合乃至作对，不是自私短识，便是别有用心，总之起了分裂乃至破坏改革运动的作用。这种不察历史实相、不问争论是非、但知以人划线的主观逻辑，曾依仗苏制教条的声势，对我们的历史研究造成多么严重的创伤，已由“文革”十年的史学史作证。

时间总对非历史的荒谬逻辑不利。随着被埋没已久的晚清文

献相继面世,尤其如《汪康年师友书札》、《忘山庐日记》、《廛书》修订手稿、《六斋卑议》和宋恕其他遗稿,以及康有为进呈清帝奏章书稿的内廷藏本等等,陆续整理刊布,无不令史家既开眼界,又发思索。关于晚清思想界的人或事,既有的历史叙述可信么?流行的价值判断可靠么?向负权威盛名的那些论著可以垂范后学么?接受非学术干预而先立论后求证的“以论带史”方法能够代替“论从史出”的传统么?很不幸,倘若真想实事求是,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那只能对这一连串疑问,予以否定性的回应。

就说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那段清末思想史吧,仅仅由于上述若干个人文献遗存公诸于众,便意味着有再研究的必要。近年关于晚清的思想史文化史,包括改革思潮史和主要人物的传记等,成为不同领域的历史讨论的共同关注对象,由此可得理解。然而所谓热点,首先仍然集中于梁启超、康有为,其次是谭嗣同、严复,一度争相抬举的章太炎似已“失宠”,这也可以理解。难以理解的,是分明已由文献昭示的某些曾对清末改革思潮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例如夏曾佑、宋恕、黄遵宪、陈三立、文廷式、杨文会等,特别是这里提到的汪康年,却少有专论,更鲜见有真知灼见的专著。

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学术上要取得任何一点突破,都如筚路蓝缕。比方研究汪康年,既无前人的系统考察可资参照,必须从史料搜寻考证之类基本功夫做起,也需面对学界似已定格的成见,有时破陈说比考史实更难。正因为这样,我对青年学者愿做沉潜功夫,去闯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去攻具有开拓性的课题,总是赞其志而佩其勇,愿为成其业而略效绵力。

十年前,廖梅作为专门史的硕士研究生,始读《时务报》,便对所谓汪梁之争感兴趣,接着发愤啃毕《汪康年师友书札》,就立志研究汪康年。说实话,初闻她的抉择,令我颇感惊异。我并不怀疑她有披荆斩棘的能力,我担心的理由已如上述,她能不计眼前功利而致力攻克这一难题么?不料她真的如期完成主题为汪康年与晚清

自改革思潮的硕士论文，并以最佳成绩免试攻读中国文化史方向的博士学位。那时她已代我给专门史硕士生讲授中国文化史基本文献课程，我原以为她的研究取向或许因此而转移。岂知她反因深一度认知文化传统，更感到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群期望清帝国“自改革”以促进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仁人志士中间，汪康年的确属于一类范型，一类重实干又徘徊于超越传统与守护传统的悖论之间的学人的表征，因而决意再用三年，从文化史角度全面地系统地剖析这一范型。

怎么办呢？我忝居人师久矣，深知古云师不必贤于弟子乃至理名言，因而向来以为导师应该尊重学生选择课题的自由，尤其应对最好的学生只给最少的干预。于是我同意廖梅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并履行第一读者的职责，尽可能周详地与她商榷论文的思路、理据或逻辑表达，而尽可能不妨碍她形成自己的总体见解和若干特识。由于人所共知的外在因素，廖梅从读硕士到读博士的那些岁月，正值我服务的复旦历史学系在新一轮劫波中苦苦求存，在这样的窘境中间，要不顾权钱拜物教的骚扰，而潜心治史论学，谈何容易。但廖梅做到了，并使我也在共同切磋琢磨过程中受益。

廖梅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现在题作《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的这部专著的原型。说是原型，因为作者已对它大事修改。本来，当年廖梅如期完成论文，不仅受到俯允评审的十六位著名专家的一致好评，并由王元化教授主持的答辩委员会以高分通过，建议授予博士学位的决议已指出论文可以立即出版。这曾引起几家出版社的兴趣，表示不附加条件为之刊行。没想到廖梅反而不着急了，每当我催她早点交稿，她总说还没改毕，如此一晃又是四年多。

当然这期间她够忙的，接替我给本科生开设专业必修课，协助我带教中外研究生，承担青年教师必做的行政事务，奉派赴日进修，还公私兼顾做了一位可爱女婴的母亲。我对此都予以同情，却

不表宽容,因为我知道她的主要障碍在于过度追求完美,而我以为完美总是相对的,古云“十年磨一剑”,尚不免瑕疵,何况“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何况任何论著只有经受不同读者挑剔批评才可判别是玉是石。

也许廖梅被我说烦了,年初忽然拿出一大叠打印稿,照例谦和地问我有没有时间翻翻?我当然翻了,发现面目一新,特别在清理史实方面,补充了她在海外找到的许多材料,重考了包括细节在内的众多事件,纠正了已有论著疏于征信的若干舛误,举证、论断和行文也较先前更加缜密。不足呢?还是谨慎有余,锋芒过敛,宁可寓论于史,较少就史立论。不过这倒突显了严谨史著的固有特色,可能更便于不同专业的读者,例如思想史、文化史、报刊史、政治史等方面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用作参考。既然如此,我读后也只会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履行多年前的承诺,写篇短文,表明我如何乐于见到廖梅博士这部关于晚清思想文化史的佳作早日面世!

2001年9月2日夜

廖梅，女，1968年出生，浙江杭州人。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96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8年至1999年赴日本神奈川大学交流访问。曾发表《〈时务报〉三题》、《汪康年与〈时务报〉的诞生》、《汪康年和庚子中国议会》等论文，并参与一系列古籍整理工作。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文化史。

责任编辑 王 纯
美术编辑 刘 菲

目 录

序	朱维铮	1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1
一、徽商的没落子孙		1
二、从小难民到一家之长		5
三、三十中举		7
第二章 成长:湖北岁月		16
一、张之洞手下的教书匠		16
二、初建社交网络		19
三、旧士子成维新人		21
第三章 创办《时务报》		30
一、初议:1894年下半年—1895年8月		30
二、与强学会、报重合:1895年9月—1896年1月		34
三、创成:1896年1月—1896年8月		43
第四章 时务报馆总理		56
一、时务报馆的人员组成		56
二、《时务报》的财务		58
三、《时务报》的发行		66
第五章 维新言论家		83
一、《时务报》的版面和作者		83
二、汪康年的言论		92
(一)汪康年的群学观:相爱		93

(二) 第一套方案:自上而下的改革	96
(三) 第二套方案:自下而上的改革	104
(四) 两套方案对维新派实践趋向的影响	109
三、汪梁论说比较	114
四、论说的反响与回应	121
第六章 维新活动家	144
一、民间维新的实干家	144
二、与日本人的交游	159
三、在维新运动中的地位	170
第七章 时务报馆的知识群体	180
一、时务报馆之争	180
(一) 汪康年与梁启超	180
(二) 汪康年与黄遵宪	192
(三) 汪梁黄之争对《时务报》的影响	199
(四) 《时务报》改官报之争的社会反响	201
二、汪康年与吴德潇	207
三、汪康年与张之洞	211
四、汪康年与康有为	215
五、中下层知识群体	222
第八章 《昌言报》和《中外日报》	235
一、《昌言报》	235
二、《时务日报》和《中外日报》	239
第九章 世纪之交的探索	245
一、地方自行改革论	245
二、从浙学会到正气会	250
三、自治成真?:东南互保运动	255
四、最后一搏:中国议会	262
第十章 否定之否定	280
一、回到中央集权	280

二、革命派的批评者和同情者	285
三、捍卫主权	293
第十一章 短暂的立宪派	311
一、《京报》：呼吁立宪	311
（一）进京办报	311
（二）立宪主张	315
二、丁未政潮：瞿鸿禨的陨落	320
三、浙江保路运动	331
第十二章 孤鸿哀鸣	349
一、撤退	349
二、缓立宪	350
三、提不出创见的批评家	353
第十三章 杰出的新闻工作者	363
一、新闻实践	363
（一）勇于创新的报人	363
（二）远东通信社	365
二、新闻思想	376
第十四章 欧美之外东方一大国	386
一、从制度解决到文化解决	386
二、中国的近代化模式	388
三、保守主义者	390
四、在时代中的位置	392
结语 中国近代化思潮中的双轨现象	401
征引参考书目	408
人名索引	424
后记	444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一、徽商的没落子孙

1860年,为解除清军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太平军决定围魏救赵,出师浙江。^①这一部署顺利斩断了掐在太平天国颈项上的死亡之手,也给饱受战争蹂躏的江南地区带来了新一轮的动荡和摧残。

沿海也不太平。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近尾声,英法联军正沿着中国海岸线挥师北上,占舟山,入大连湾,取北塘,陷通州。9月22日,清帝爱新觉罗奕訢以秋季狩猎为名,仓皇避往热河,^②在清朝统治史上开创了外敌压境之时,皇帝离京出逃的先例。他身后,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的大火映红了京城上空。

内忧外患,清帝国在军事上陷入两面受敌的危险境地。军事形势是政治形势的缩影,时间才过了一个甲子,乾隆盛世似乎已成为遥远的回忆,政治腐败,吏治糜烂,财政紊乱,武备废弛,现行机制终于负荷不起两千年专制制度的积弊,以及乾嘉两朝孕育的隐患。而越洋前来的商船和战舰,也给古老的土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清帝国和专制制度双双进入危机时期。

危机也带来转机。清王朝实行自强新政,帝国内部出现了短暂的“中兴”景象。1860年,成为晚清史上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年份。

汪康年便出生在这个转折之年。

汪康年的祖先是安徽黟县人，明代万历年间，贩盐至杭，遂在杭州安家落户，属于钱塘县商籍。以后汪家先人改行经营典当业。经过百年积累，终于跻身杭州商界最富有的四大家族行列。唯一的遗憾便是科名未显。^③

侨居异乡的徽商为提高社会地位，常常鼓励子侄博取功名，并大力兴办文化事业，清代乾嘉学派许多有名的汉学家都曾获得过徽商的资助。汪家致富之后，亦投身文化事业，老辈们忙着藏书，小辈们赶着补文化课。汪康年的本生六世祖汪宪（1721—1771）是汪氏家族的第一位进士，每见好书，便不惜斥资购置，并积极与杭州的小山堂赵氏、飞鸿堂汪氏、知不足斋鲍氏、瓶花斋吴氏、寿松堂孙氏、欣託山房汪氏等六户藏书家往来交流，见到过许多宋元珍本，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浙西汪氏振绮堂藏书在乾隆年间成为浙江最重要的藏书之一。^④四库馆征求海内遗书，振绮堂曾进呈善本书百十余种。藏书事业的发达，提高了汪氏的文化修养和在知识阶层中的地位。果然，隔了两代几十年，就出了一位令汪姓引以为豪的经学家兼诗人汪远孙（1794—1836）。汪远孙字小米，嘉庆举人，做过内阁中书，是汪康年祖父的大哥。汪远孙风流好客，倚仗家族财势，曾经广聚江浙名流，结东轩吟社，每月一集，传为美谈。^⑤龚自珍是汉学大师段玉裁的外孙，世家子弟，见多识广，比汪远孙年长二岁，也亲眼目睹振绮堂藏书的规模，曾撰诗感慨：“振绮堂中万卷书，乾嘉九野有谁如？”^⑥汪家以经商起家，终于发展为声名显赫的书香门第。这一家世，影响了汪康年日后的择业取向。他大力搜访书籍，刻成“振绮堂丛书”两编，并终身从事出版业，除了有其自身的思想内因和事业追求外，还有来自祖上的熏染。

不幸，汪远孙以降，家用日繁，家产却日渐减少；汪康年的祖父在晚年又显然丧失了徽商先祖的经商天份，居然被自家当铺中的管事所骗；雪上加霜，这个在中世纪晚期绵延了十几代两百余年的

大家族,终于走上了没落之路。

江河日下的局势给了汪姓家族以最后一击。1859年与1860年相交的冬天,汪康年的父亲、二十八岁的举人汪曾本(1832—1882)为躲避太平军和清军的混战,护奉老母,率领身怀六甲的妻子和幼小的一子二女,从杭州城逃到三角荡岳父家避难。清咸丰十年正月初三,也就是1860年1月25日,战争的阴影侵蚀了喜庆的气氛,汪康年却不晓世事地在外祖父家中呱呱落地,父母替他取名灏年,字梁卿,小字初官。3月19日,太平军从清波门攻入杭州,^⑦汪家未及出逃的亲戚大半遇难。

汪康年早年的遭遇也是一代人的共同遭遇。清帝国正处在大动荡大流亡中,咸丰帝到了热河;江浙难民涌入上海,1865年的租界人口比1855年净增11万之多;^⑧还有一些江浙士绅避兵或南或北,汪康年的乡试同年、商务印书馆元老之一张元济的父亲便在1863年由亲戚带至广东,日后张元济就出生在广州;^⑨汪康年的另一位好友,曾出任上海“中国议会”成立大会主席的叶瀚,则出生在流亡地河南。^⑩

但汪曾本没有盲目乱跑。他已成断根之人,既无家产可以继承,又无祖上功名可以得着荫封,只有靠考科举谋做官,维持生计。他所选择的流亡之路,便与求仕之路合而为一。这位上有老下有小、还不到而立之年的年青人以此表明,他不会因为战乱就放弃提高自身地位的努力。

1860年9、10月间,汪曾本被任命为浙江景宁县教谕。景宁地处浙西山区,汪曾本私冀此地可避兵祸,毅然举家赴任。还在襁褓中的汪康年,便跟随父亲踏上了边做官边流亡的道路。

谁知景宁是浙、闽、赣的交通要道,两年内三过太平军。1862年冬,汪曾本迫不得已将家眷托付同乡,带至江西余干县社洪镇避居。汪康年的长兄就在江西不幸夭折。1863年,汪曾本满怀希望入都会试,这位1851年的恩科举人,继1852年会试不成后,再次

名落孙山。由于家庭负担沉重，他东凑西挪纳费为盐课司大使，指分广东候补。和县学教谕一样，这也是正八品的微职，即使实授，靠正常收入养家糊口也很难。但以汪曾本的资历和财力，已无挑选余地。1864年农历正月，分离了一年多的全家人终于在广东团聚，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在广东的二十年，汪曾本再也没有进过考场。他自幼即以文学见长，二十岁便中举，在乡人眼中是汪家的一颗新星。不料家事国事，迭遭变故，“既无先业可守”，^①两次会试又惨遭重创。人人壮年，母亲渐老，七个孩子又一一降生，汪曾本再也无暇从容应试以搏取更高的功名，只好挤在候补官员的行列里，等待上官赐予某种临时性的“差使”。这二十年内，汪曾本得到过四种差使，短如□庙缉私差，^②只有六个月，长如盐务公所差使，不过两、三年而已；还补过一次为时一年多的缺；两次在做小官的世交长辈处临时帮忙；靠关系，在海关谋到一事。其余失业的日子，只好凭借贷质当为生。他曾经两次准备加捐花样，早补一缺。第一次让经手之人卷款而逃；第二次总算捐升知县，算是正七品，但不放实缺，便依然是空名。汪康年把父亲仕途坎坷的原因归结为“谨守书生本色，故不能得志”。^③汪曾本确实不善钻营，康有为比汪康年年长两岁，同样出生于太平天国的炮声中。但康家成员酷爱武功，显然比文质彬彬的汪氏家族更适应乱世，在汪曾本沉沦宦海底层，以候补知县的身份辞世时，康氏家族却靠镇压太平军而突然贵盛起来。^④

1880年，希望之光似乎就要照到为生计奔波的不幸人身上。汪曾本的堂兄汪守正，字子常，在山西阳曲县知县任上，由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推荐，入京替慈禧太后治病，并在各省所荐八名“御医”中获得赏识，与薛福辰奉命于慈禧病愈后仍留在直隶供职；^⑤同时，汪家的世交姚觐元又在1879年至1882年间出任广东布政使。一时间，官场上纷传汪曾本就要得志了。然而，1882年12月20日，这位不会钻营的老实人却撒手病逝，享年五十一岁。